

- 君子聚财 取之有道
- 这是使中国的实业家辉煌崛起的一部圣经
- 她将指引您踏上遍布真金实银的发迹之路



中华 大实业家

发迹录

莫言钧 主编

红旗出版社

中华大实业家 发迹录

莫言钧 主编

红旗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8 号

中华大实业家发迹录

主 编 莫言钧

责任编辑 王农媛 封面设计 王中兴

出 版 红旗出版社 (北京沙滩北街 2 号)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787×1092 32 开 11.5 印张 242 千字

199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册

ISBN 7-80068-517-9/F · 75

定 价 7.00 元

目 录

中华荣氏家族的大实业家	(1)
中国的“红色资本家”王光英	(53)
中华状元实业家张謇	(82)
中华大实业家陈嘉庚	(137)
头戴三顶王冠的大实业家刘鸿生	(168)
中华航运业第一人卢作孚	(195)
李嘉诚从推销员终成香港大实业家	(227)
“世界船王”包玉刚	(258)
台湾塑胶业的拓荒者王永庆	(295)
全球最富有的中华大实业家蔡万霖	(328)

中华荣氏家族的大实业家

在中华民族先进人士实践“实业救国”的漫长道路上，其最大的一个民族资本系统就是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所创办的荣家实业集团。这一实业集团包括茂新面粉系统、福新面粉系统和申新纺织系统等三个子公司及其关系企业在内的40多个民族资本工厂和事业单位，它们在中华民族面粉工业和棉纺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00年起，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靠着四套炼石石磨办厂创业，艰苦奋斗，饱经风雨。到1932年，荣家申新纱厂系统共拥有5357台布机，521550枚纱锭，40040枚线锭，年产棉布28万余匹，棉纱306250件，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厂总产量的1/5；茂、福新系统共有12家面粉厂，股本额达7905840元，占全国股本总额的35.3%，其规模占全国关内各省面粉工业的1/3；荣家所产“兵船”牌面粉已畅销华北地区，远销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及南洋各地，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家民族资本实业集团。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成为饮誉中外的“实业巨子”、“粉、纱大王”。荣家实业集团在荣宗敬、荣德生、李国伟、荣鸿元、荣尔仁、荣毅仁等一批民族实业家的主持下，苦心孤诣，认真经营，到1949年，荣氏企业已遍及上海、汉口、无锡、广州、济南、天水、重庆、成都、宝鸡、香港、台湾、东南亚以及南美洲各地，荣氏家族作为旧中国的“十大巨富”之一而在实业界赫赫有名。同时，荣氏兄弟还热心于公益事业，凡

遇“水旱之偏灾，捐输之义举，弟见其解囊恐后”，斥资修路，架筑桥梁，广设庠序，发粟赈灾……这一切的确难能可贵，在解放前已经是了不起了。然而，作为荣氏家族第二代实业家的荣毅仁先生从1979年担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以来，仅9年时间就投资、合资搞了209家企业，成为“中国第一号资本家”（香港《财富》月刊），并被美国著名大型杂志《幸福》半月刊组织的专家组评选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中的一员——更是令人钦佩不已。中国有句老话，就是“创业容易、守业难”，换句台湾大实业家王永庆的话：“富不过三代”。可是，谁又能料到“这位‘红色资本家’的公子”锋头之健，在1992年就曾因惊天动地地收购老牌华资大公司恒昌行而被港人誉为“亿万新富”；荣智鑫走出名门之后，“大陆的开放风气和显赫的家世”，使他在国内的发展一帆风顺。现在，荣氏家族至少有300名成员分居在海外和港澳地区。其中不少人在世界各地显露身手，并且在当地实业界具有相当影响，这主要指荣氏家族的第三代实业家。

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创业维艰 历经风雨 荣氏兄弟终成粉纱大王

无锡位于江苏省南部、太湖北岸，境内河流纵横，风景秀丽，盛产稻米、小麦、蚕茧等，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为荣氏企业集团的最初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荣氏企业的奠基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出生在无锡境内西乡荣巷农村的家庭里。他们的祖父“素业商”，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就开始做贩

运生意，是一个商业者。父亲荣熙泰，又名兰川，曾经受父亲之命在花铁肆做工，不久便管理铁肆帐目。在荣氏兄弟祖母去世后，荣熙泰辗转到浙江，在乌镇一家冶坊做过帐房先生。荣宗敬、荣德生的母亲姓石，无锡山北石巷人，嫁到荣熙泰家以后，仍利用自己的土地植桑养蚕，务农劳作。1883年，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随太湖水师提督王青山到达广东。当时，荣熙泰的族叔荣俊业在总督张之洞营务处当差，便推荐太仓人朱仲甫在广东的磨刀口做厘差，并推荐荣熙泰和朱仲甫共同做事，从此荣熙泰和朱仲甫两个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887年，荣熙泰又随朱仲甫到肇庆府知府做上任总帐，直到1895年年底，荣熙泰才离开广东。荣熙泰在广东先后做事达十余年之久，使荣家有了一些积蓄。

荣宗敬生于1873年，7岁入塾，从殷省甫启蒙，“为文倜傥有奇才”，殷省甫称赞他为“非凡才”。荣宗敬的弟弟荣德生生于1875年，名宗铨，号乐农。他于9岁入塾接受启蒙教育，《荣氏宗谱》载荣德生“少负大志，博览经史”。荣氏兄弟读了五六年私塾，“年未弱冠”，就往来于上海和无锡之间，学习做生意。1886年秋后，荣宗敬就到上海在铁锚厂学徒。次年荣宗敬15岁，再返回上海在一姓卫的人家开设的源豫钱庄学徒，三年期满后，就到上海南市森泰蓉汇划字号当“跑街”。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汇划字号钱庄歇业，荣宗敬返回无锡老家。荣宗敬的弟弟荣德生15岁那年，也在上海钱庄习业。当年（1889年）除夕，通顺钱庄老板要荣德生去请对门的王先生写字，张贴庄名新纸，结果荣德生连跑多次都未请动这位王先生。这件事对荣德生触动极大，他“自此思求人不如求己”，明年钱庄的招牌他立志要自写自贴，于是荣德生

便发愤苦练，第二年除夕终于大显身手，深得钱庄老板的赞赏。由于荣德生聪慧好学，还未满师就已经掌握了钱庄业务。满师后，他嫌钱庄出俸微薄，就随父亲荣熙泰去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当司帐，安排在帮帐房，做按号录底、收入、结数、存库单等工作，增加了荣德生不少见识。

1896年，荣德生和他的父亲荣熙泰一起回到无锡老家。当时南方一带开钱庄的风气盛行，小钱庄主要从事兑换业务，规模大的除办理存款、放款业务、开发庄票之外，少数还发行银钱票。荣熙泰看到不少钱庄获利颇厚，加上荣氏兄弟又都是钱庄出身，于是便与人合伙在上海开设了3000元资本的广生钱庄，荣家兄弟投入半数资本，由荣宗敬担任经理，荣德生管理正帐，待无锡分庄设立以后，荣德生又兼任分庄经理。当年6月，荣熙泰不幸去世；广生钱庄开业两年来盈利不多；再加上另外三个股东认为荣氏兄弟年轻，没有多少经验，便抽出了股金，因此，从1898年起，广生钱庄就由荣氏兄弟独资经营。他们勤勤恳恳地支持着钱庄的运转，使钱庄的生意渐渐地红火起来。自1900年到1902年的两年时间里，由于义和团运动使内地汇款激增，广生钱庄纯盈利就达1万两，荣氏兄弟“想从此余利可向自营实业上注意”。由于广生钱庄生意兴隆，盈利丰厚，荣宗敬便想添营熟煤，但未能成功。1907年，裕大祥拓展其业务范围，涉及纱厂、粉厂、油号、保险，并专做洋布和面粉，各人自做橡皮股票、大油股票等。这是一家投机商号，由茂生洋行买办张麟魁、怡和洋行买办荣瑞馨（荣宗敬的族人）、西门子洋行买办叶慎斋、横滨正金银行买办叶敏斋等主要股东主持，只要有钱可赚，他们什么生意都做。荣宗敬为了便于自己的经营活动，投资于

裕大祥，兼营股票生意。荣氏兄弟开设钱庄，经营汇兑，还利用无锡作为江南著名蚕丝产地的自然优势兼营收茧业务。荣德生先生时常对人讲，荣家开设茧行，年年可赚，从来未亏。究其原因，荣家收茧业务除利用洋厘差价等办法之外，还利用广生钱庄的汇兑业务，无息地运用顾客的汇款大量收购茧子，加上荣氏兄弟和当时无锡的丝业大王薛南溟（薛福成之子）向来有关系，将收得的茧子售给薛厂则彼此互利。荣家茧行历史悠久，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登陆才被迫停止。

1900年，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攻破清京。各地风声鹤唳，人心慌慌。恰逢在广东担任补抽局总帐房的荣德生因上级税务主持者有易人之说，借故请假回家。来到上海以后，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往来于广东、上海、无锡之间，看到“生齿日繁一日，舶来品日盛一日，不禁兴起创办实业思想”。鸦片战争以后，外商洋行以供应侨民食用为名，把免税进口的洋粉向中国大肆倾销，时局的紧张，粮食的奇缺和战争的影响，往往为营销粮食、面粉的业者带来丰厚的利润。荣德生先生日理税务，“知面粉人口，载明条约，为洋人食品，得免捐税，输入之数，独冠各物，名为外人所需，实则华人之需要亦颇巨”。1900年，他看到“各业均平淡，惟面粉厂增裕、阜丰反好”，尽管当年广生钱庄营业转佳，信用也好，但考虑到钱庄放帐利润微薄，不如自己投资经营，利益较大。经过一番筹划以后，荣宗敬也赞成创办面粉事业。有鉴于此，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便把广生钱庄的盈余作为兴办实业的资本来源，与卸职归里的朱仲甫合作集资39000元，在无锡西门外太保墩开办保兴面粉厂。1902年，保兴投产，所用机器为4部法国炼石石磨，雇工30余人，日出面粉300袋。次年合

股人朱仲甫重入宦途，因对粉厂缺乏信心而退股，荣氏兄弟只好另行添增股份到2万元，改名“茂新”粉厂，分任批发经理和经理。后来，荣德生把当年保兴粉厂的四套石磨陈列在梅园山顶上，把它当作荣氏实业集团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基石以为纪念。1905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与上海买办荣瑞馨等合股集资兴建无锡振新纱厂。振新建厂初期，大权在荣瑞馨手中，但由于他经营不善，纱厂董事会另聘荣德生为经理。1913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新建福新一厂。次年，荣德生提出要扩建振新，二厂在上海；三厂在南京；四厂在郑州。“董事会闻之大骇，谓若此即赚钱，股东永无希望拿到现钱”。荣德生说：“要拿大钱，所以要大量生产，照三万锭能赚几何？彼时内地无过三万者，所以看得大。”由于振新股东之间发生纠纷，荣家退出，采取无限公司形式，创办申新。凡企业的经营大权、财务运用、原料和物料的采购、人员的雇用和成品的营销，均由荣宗敬一人全权处理。从此，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正式走上了以荣氏家族为中心，主要依靠银行信贷、企业自有资金来经营实业的道路。

申新纱厂的创办，正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期间洋纱输入锐减，国内纱价高涨，棉纱业成为实业投资的一个热门行业。在这种形势下，申新纱厂开工两年即盈利50万元，为总资本的1.7倍。1917年3月，荣氏实业集团以40万元买下日资恒昌源厂，至1919年3月，正式转移产权，对外改称“申新二厂”，在中华民族“实业救国”的漫长道路上，“日商纱厂为华商购得者，只有此厂，在棉纺织史上放一异彩”。1921年，荣氏企业又添申新三厂、申新四厂，因此，大战期间，荣氏纺织实业发展极为迅速。与此同时，本

阶段荣家面粉企业奔腾直上，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荣氏福新系统从1个工厂发展到8个工厂，并租进一个元丰面粉厂，如果加上同一资本系统无锡、济南茂新系统的4个厂，则1921年荣家茂新、福新系统总生产能力占了当时全国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生产能力总量的24.62%。到1922年，荣氏资本由初创时期的5万元猛增到1043万元，固定资产由5万元上升到19586890元，其中自有资本从1915年到1922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9.7%，固定资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4.9%。作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实业集团的创业者和领导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成为饮誉中外的“实业巨子”、“粉、纱大王”。可惜好景不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瞬间消失。荣氏实业集团和全国大多数民族资本企业一样，在外国资本、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走走停停，时快时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前夕。

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和剥削之下，经常面临严重的危机和破产的风险。荣家企业在诞生的初始阶段，就必须面对这种险恶的外部环境而采取对策。1900年荣家兄弟创建保兴面粉厂，在兴建厂房时就受到地方封建势力的干扰。他们以建厂破坏“风水”为理由，百般滋事。后经荣宗敬、荣德生先生奔走呼号，纵横捭阖，才使保兴粉厂投产出粉。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商品大量倾销国内市场，使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处处被动而又奈何不得。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外货倾销并操纵中国市场，荣家茂、福、申新企业营业亏损，企业发展受阻。情况

更加严峻的是，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等“四大家族”为主的官僚资本在1927年左右逐步形成后，便与腐败的国民政府紧密勾结，开始了对中国民族资本的敲诈勒索。1927年，蒋介石势力伸至长江下游，借虞洽卿之手向各行业摊派所谓“二五库券”。荣宗敬先生认为民族工业势薄力微，若再加捐负，则更不能和外国资本竞争，因此表示不愿之意，应允较迟。不料竟遭蒋介石密令，要求无锡县政府着手查封荣氏产业，并通令各军侦缉。但是宗敬先生身住租界，蒋帮不敢下手，便指使无锡县政府查封荣家西乡荣巷家门。后来荣家托人疏通，承购50万元的“库券”（实支四十七八万元），并向工部局花了一些钱，才将此事化了。同年7月，国民政府托词裁厘，开征“特税”。荣家宗敬先生认为当时中国民族实业尚处在萌芽状态，17年以来的纺织业受时局影响更是岌岌可危，便呼吁豁免统税。申汉纱厂有人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反映民族实业的困境，不料孔祥熙不问青红皂白，开口便骂纱厂捣蛋，大叫：“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事情结果自不待言。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势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共谋改进之道”，决心变法，“力劝各厂整理革新”。从1923年起，荣家兄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对荣家企业系统进行了管理改革，取得了良好的绩效，帮助荣家企业渡过了不少难关。另一方面，荣氏企业在整理革新的同时，迎难而上，举债发展，到1936年终使茂、福、申新系统的状况蔚为改观：荣家企业茂新当年盈利3.5万多元，福新盈利11.3万多元，共计14.8万余元，占1936年资本总额的近1/6；资本额从创业时期的3万元，到1936年茂新增至21万元，

福新增至 75 万元，共计 96 万余元，比创业时期增大了 32 倍。

荣家实业系统及其关系企业，大部分集中在无锡、上海、汉口、济南等地，因此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企业损失极为惨重。“八一三”战事中申新一、八厂被炸，申新五、六、七厂原料、机器遭劫，申新二、九厂仅开日班；上海福新各厂损失严重，北销断绝，各厂一度歇业；无锡茂新、申新三厂陷于敌手；济南沦陷后，茂新四厂押存银行的面粉被提充军用、战事中所存原料和成品遭劫。在日伪的破坏和劫掠下，荣家企业从 1937 年到 1945 年损失按战前币值计算约 5281 万元。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杀戮、劫掠和威胁，荣德生先生坚定地讲，“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充分表现了一个中华民族大实业家的爱国主义节操。不幸的是，荣家企业的初建人之——荣宗敬先生在香港“忧虑”成疾，旋即于 1938 年逝世。此后，荣家企业内部矛盾暴露，逐步形成以荣宗敬之子荣鸿元为首的总公司（大房）系统、以荣德生为首的总管理处（二房）系统和以荣德生之婿李国伟为首的“申四福五”系统。

1938 年 5、6 月间，日军进逼武汉。国民党政府下令各企业一律内迁，否则即予炸毁。在李国伟的极力主持下，荣家申四、福五于当年武汉撤守之前内迁，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此间李国伟针对后方形势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营策略：第一，根据战时特点，采取综合发展和分散相结合的措施；第二，为促进内地实业发展，自建运输队，在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初步形成了一个荣氏后方企业的水陆运输网络系统；第三，自制机器设备，为荣氏内迁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客观上讲，由于战时后方军民衣食需求量骤增，荣

氏企业规模有了长足发展，申四、福五系统也获取了巨额盈利。抗日战争期间，申四、福五系统先后在宝鸡、重庆、成都、天水等地开设了10余个工厂。尽管此间这些企业总的生产能力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在粉纱两个行业外，李国伟又新创办了铁工、造纸和煤矿等企业，营业范围有所拓展，而且盈利总额远远超过战前的水平。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抗战胜利后，荣家实业集团各系统开展了重建及扩展。其中以荣鸿元为首的大房系统，在恢复申一、六、七、九厂和福一、二、三、四、六、七、八厂的基础上，新置10余个工厂企业（在香港创办了三个纱厂），业务范围涉足面粉、棉纱、印染、包装、储运、机械制造等方面。以荣德生为首的二房系统扩建了申二、五厂、复建无锡申三、茂一，新建开源机器厂和棉麻毛纺织厂。1946年，荣德生在上海筹建天元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以进出口业务为主，其中进口各种商品以自营为主，出口以纱布为主。天元实业公司还在香港、曼谷、纽约等地设置分公司，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的3个儿子都在天元公司里担任要职。以李国伟为首的“申四福五”系统为战后内地实业的发展起了大的作用，李国伟主持新昌6个工厂，包括在香港新建的九龙纱厂。然而就整体而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横征暴敛，中国的民族实业本身无不在崩溃的边缘挣扎，荣家各企业也是如此。荣德生先生曾经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希望通过“盟军总部”向日本索取荣家企业的损失，但经过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经济部，外交部和工商部的相互扯皮，辗转行文达两年之久，结果不了了之；同时，荣德生先生还希望在政府的扶持下来重振实业，但是

国民党政府的疯狂搜刮和严厉管制使这些幻想一一破灭了。

在旧中国，一些富商巨室遭劫被绑事件层出不穷，但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内，在上海发生的绑票案件之频、赎金之多，却是前所未闻的。1946年4月，国民党政府军统特务勾结上海嵊县土匪将荣德生先生绑架，险些撕票，并敲去60万美元。这是此间最为社会震惊的绑票案件。1948年，荣德生先生的侄子荣鸿元又遭蒋经国逮捕，向荣家敲诈50万美元才将荣鸿元释放。这些事件接二连三，使荣德生先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促成了他后来坚定反对迁厂逃资。1947年下半年，全国解放已是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便煽动、威胁民族工商业者迁厂逃资。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荣家企业的不少领导人纷纷向台湾、香港、泰国、美国、巴西、菲律宾等地迁厂。但是，荣德生先生历经国民党统治下的风风雨雨，又对共产党的政策有所耳闻，极力反对外迁。荣德生先生还力劝其他人不要迁厂，并且亲自前往码头追回部分机器。荣德生先生公开表示：“生平未曾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他“非但决不离沪，并决不离乡”，因此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荣德生先生派私人代表前去苏北解放区，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他决定留在无锡老家等待全国的解放。

在解放前，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除了兴办实业外，还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赠给荣德生先生一首长诗，其中写道：“斥资修道路，行旅便驱驰；青年苦失学，庠序广设施。桥梁筑千座，实践此宏愿；发票赈灾荒，全活奚止万”。荣德生先生斥资修筑通惠、锡梅路，帮助地方修建了88座桥梁，和荣宗敬先生举办了20多所各

式学校，辟建了驰名中外的梅园、锦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荣德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署副主任等职，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2年7月29日，荣德生先生不幸在无锡逝世。临终前，这位中华大实业家不禁感慨万千：“余从事于纺织、面粉、机器等工业垂60年，历经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及反动统治的压迫，艰苦奋斗，幸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革命胜利，欣获解放。目睹民族工业从恢复走向发展；再由于今年（1952年——作者注）‘三反’、‘五反’的胜利，工商界树立新道德，国家繁荣富强指日可待。”同时，荣德生先生还谆谆教导子女“要积极生产，为祖国出力”，表达了他高度的爱国情操和中华民族老一辈大实业家的共同心声。

不让陶朱 何逊白圭 荣氏家族自有经营之道

荣家企业从1896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开设广生钱庄，经营汇兑业务起家，到1954年和1955年间，武汉、无锡等地的荣家企业及上海的申新、福新诸厂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共经过了60个春秋。荣家实业集团在荣宗敬、荣德生、李国伟、荣鸿元、荣尔仁和荣毅仁等一批大实业家的主持下，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古代优秀的企业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了荣家特有的一套经营管理方法，大大丰富了中国的企业管理思想宝库。荣氏实业家们正是运

用这一系列独有的经营管理之道，从而奠定了荣氏实业集团在中华民族实业发展历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荣氏实业家继承中国古代商人“无息币”的思想，逐步形成了“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的经营战略。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人，在越国作大夫。当越国被吴国打败时曾赴吴国作了两年的人质。回越后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发愤再起，卧薪尝胆，终于一举灭吴，传为佳话。范蠡在助勾践灭亡吴国之后，恐于“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遂到齐国经商，化名鸱夷子皮。辗转到山东的定陶（现今山东省肥城市西北）后，改称陶朱公，成为中国社会2000多年来人们崇拜的大商人。他在谈到自己的经商秘诀时，介绍了“无息币”的光辉思想。所谓“无息币”，就是“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使其处于不休止的周转流通状态，俗而言之，就是使死钱变成活钱。作为商人，不可轻视已经获取的利润，但他的目光更要盯着未来的利润，必须以钱生钱，永不休止。陶朱公的“无息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普遍规律。2000多年后，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资本论》中论述货币转化为资本时指出：“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绝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马克思认为这种绝顶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是资本家的特征，精明的资本家会不断地把财币重新投入流通，以谋求财币的无